

关于中国文言小说史的几个问题

吴志达

文言小说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特殊的表现形态。它源远流长而代有变化。本文认为应以求实的态度,探索其渊源与流变,而不能拘泥于“小说”的一般定义。研究这种小说形式与内容形成的原因,它与白话小说在审美特征上质的差异,它的发展历程及其特殊规律,它与各体文学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抓住文言小说这一重要环节,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许多问题。

一、撰写中国文言小说史的必要性

我国的文学遗产丰富多彩,就文学样式而言,也五彩纷呈。除了诗歌以外,散文、小说、戏曲,也都非常丰富,而且各种文学样式的历史都相当悠久,艺术上各自具有难以取代的特色。但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儒家学者把诗歌置于最崇高的地位,充分肯定诗歌的作用,而瞧不起小说。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很明确地指出诗的功能。曹丕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②是指诗赋、散文与功业的重要关系。在汉代以前,小说根本就不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仅仅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艺,即所谓“小道”,是与堂而皇之的“大道”相对而言的。孔子的学生子夏,认为此类小技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倒是很有见识的,但是他也认为“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③这与庄子所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④都是鄙视小说的态度。当然,他们并不是指作为一种文体的小说而言。班固却把“小说家者流”与“小道”相提并论了^⑤。尽管小说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并无经世致用的功能。

历来儒士是热中于用世、建功立业的,既然小说无补于事功,也就不愿意自觉地从事小说创作。从先秦诸子到汉代,士人著书立说,都想成一家之言,为王者所用,立身扬名,小说家者流,只能列于九流十家之末。人微言贱,《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小说家”著作,大都散佚殆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不被封建统治者及儒生所重视,可能是被湮没的重要原因。偌多儒家经典、诗文辞赋都得以保存下来,正好从另一方面说明小说的不受重视,所以湮灭。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士人的思想信仰呈现出多元状态,价值观念有所变化,自我意识和主观幻想得以表现,小说创作在文坛上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许多在政治上或文化领域中有名望的人,也写起小说来,或志怪,或志人,乐此“小道”而不辞。

至于从理论或史的角度对小说艺术进行系统性的探讨与论述,在明代中叶以前,可以说还

没有。唐人的小说观,比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小说创作者有较大的进步,但是论述的侧重点局限于对小说功能、审美作用的认识,还谈不上小说理论的建树。比较系统地研究小说理论,首推明代的胡应麟,但距离小说史的框架还很远。从晚明至清末,对几部白话小说研究较多,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都对某一部小说作过深入研究,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小说理论,却一直没有人能写出一部中国小说史。鲁迅深有感慨地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⑥鲁迅说的是20年代初的状况,此后治中国文学史者,逐渐加多小说在文学史中的份量,并且写出几部小说专史,但大都侧重于白话小说,文言小说的比重很轻,这与小说发展史的实际情况不大相称。其实,在宋以前的小说,几乎都是用文言写的(唐时已有“话本”之类的“市人小说”,但流传下来资料很少)。可与唐诗媲美、并称为“一代之奇”的唐人传奇,就是唐代的文言小说,它是我国小说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一高峰的出现,除了唐代社会特殊的诸多原因以外,从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来看,也是文言小说经过长期演变发展的结果。

自宋元以后,白话小说虽然成为小说的主流,但是文言小说并没有消声匿迹。只是在宋元“话本”繁荣时期,传奇体的文言小说趋向衰微、作品相形见绌罢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元代居然出现宋梅洞的传奇小说《娇红记》,故事之哀婉动人、艺术形象之丰满突出、结构之曲折完整、篇幅之长大,较之唐宋作品,都有所发展。因而,在明清白话小说昌盛之时,文言小说由复苏乃至出现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新的艺术高峰,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国古典小说,自宋元以迄明清,是沿着文言与白话双轨并行发展的,而在文学史乃至小说史著作中,又大都偏重白话小说;因此,对文言小说发展的内部规律、艺术特色、它与白话小说的异同、与诗歌、散文、戏曲等文学艺术样式的关系,以及它的审美价值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似多有欠缺,读中国小说史著作,不免有跛足巨人之憾。所以,写一部文言小说专史,是很有必要的。

二、研究中国文言小说史的目的与方法

由上述可见,研究中国文言小说史,其目的是要确立它在小说史上的应有地位,探索它特殊的发展规律,总结其思想意义和艺术经验,为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不仅如此,还因为它曾经多角度地、较广泛而深刻地展现过我国历史上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审美趣味,以及传统文化特征。它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用来映照社会人生也映照自己内心世界的镜子,我们将从中认识到在正史或诗文中某些不曾见过的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并在艺术上得到丰富多样的美感享受。它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文学样式,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一种特殊的表现形态,因而研究它,是很值得的。弘扬这份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学术界曾经讨论过如何编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我在《明清文学史·明代卷·结束语》中,简略地谈及自己的一些想法。撰写文言小说史,也存在同样的需要合理解决的问题。如何建立能够体现文言小说发展实际情况及其客观规律的体系、史论与作家作品、流派风格的介绍或赏析的关系等等,是属于研究方法的问题。

既然是文言小说史,当然重在阐明文言小说发展的线索及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探讨不同的流派与风格,指出它们在文言小说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史论与作家作品及流派的介绍分析,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离开具体的作家作品及流派的分析,所谓阐明

史的线索、发展规律、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就会失于空泛,成为虚构的幻影;但是过多地或者仅仅停留在作家作品的介绍与鉴赏,缺乏史的线索和理论性的探讨与概括,以及必要的考证辨析,也就不成其为史。

三、文言小说的源流及其基本特征

中国文言小说源远流长。关于它的渊源,众说纷纭。有典籍可考、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是从汉代开始有小说。但是我认为,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似不能完全拘泥于“小说”的一般定义,特别是考察古小说的渊源时,视野不妨放宽一些。“小说”的概念,也有一个演化过程,从庄子、桓谭、班固、刘知几、到洪迈、胡应麟、纪昀,在进化中概念逐渐严密起来。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先有其名后有其实,而是在客观世界中先存在某种事物,才产生与其相应的概念,而概念的内涵也会有发展变化。因此,在研究文言小说的源流变迁时,既不能用现代“小说”的概念去规范古人,也不能为古代的传统“小说”概念所束缚。凡是一种文体,都不是骤然产生的。尤其是象文言小说这样最有中国特色的小说,由原始的萌芽状态发展到成熟、乃至达到这一文学样式的艺术高峰,其间几经融汇变化,吸取了神话、寓言、史传文学、诗歌等各种文学艺术的精华,才出现唐人传奇、《聊斋志异》等高标格的文言小说。作为文言小说史,就应该尽可能把它的渊源与流变探究清楚,不能局限于“小说”概念确立或公认为“小说”的作品产生之后的范围。而是应当通过对其渊源与流变的探索,弄清这种小说形式与内容的特色及其形成的原因,理清其嬗变过程。我在《古小说探源》一文中^①,曾论及这个问题,兹不赘述。

文言小说的文体规范,是与白话小说相比较而言的。它们的渊源有许多共同点,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但是又有质的区别。它们用来写作的语言工具不同,前者是文言,后者是白话,这是显而易见的,也只是表层形式的区别。

大体说来,我国的白话小说受民间“说话”艺术的影响较深,除了像《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雅味较浓的艺术精品以外,在当时,读者主要是略有文化的市民和农民;因此,从作品的内容到艺术形式、表现手段,大致上与略有文化的市民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审美意识、艺术趣味、欣赏习惯相适应。所以人们称宋元以来的大多数白话小说为“市民文学”,或称之为“通俗小说”。

文言小说则不然,它比之白话小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作者是文化修养较好的士大夫,虽然某些作品的题材或原型,也来自民间传说或“说话”,但经过士大夫文人的再创造,即使还保留民间文学的某些色彩,但已经打上了文人作家的印记,书卷气较浓,故事较完整,结构更严密,艺术水平有所提高。例如晋干宝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中《三王墓》、《韩凭夫妇》、《李寄》等篇,唐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传奇,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许多名篇,都留有民间传说、故事的色彩,但是有作家自己的创作动机,熔铸著作者的思想感情,或发明鬼神之不诬,或表现对士族婚姻制度的不满,或抒发胸中的积愤,也有着作家创作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更多的文言小说,是作家直接取材于历史或描写现实生活,乃至以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为素材,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更鲜明。在唐人传奇和《聊斋志异》中尤为突出。

其次,与前一特征密切相关,文言小说的语言,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作家,风格固然有所不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与委婉细致的唐人传奇,写法有很大区别,但基本上都比较精炼、雅洁。它既不是供说书艺人作底本的,也不是供市民阅读欣赏的。它的作者和读者,都是知识阶

层,无论是何种题材的作品,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的主导倾向是雅,而不是俗。凡是取材于文言小说的话本或拟话本,作者都需要经过一番融化稀释、将雅变俗的加工过程。如果我们把“三言”、“两拍”中的某些拟话本小说,与同样题材的文言小说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者是多么的不同。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会感到,读文言小说更具有隽永的回味,有一种含蓄幽雅之美。

再次,从文体规范来看,如果说白话小说重在写实、逼真、细致、描写人情物象,往往穷形极态,淋漓尽致,是一种再现艺术,那么文言小说则重在神态韵致、风貌格调、气质意境的描写,往往遗貌取神,与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关系较密切,是一种表现艺术。文言小说中的笔记志人小说如《语林》、《世说新语》等,篇幅简短,文笔简约冷峻,而善于抓住具有典型特征的言动细节,表现人物的神韵风度;传奇体小说受史传文学的影响,故事首尾完整,人物形象血肉饱满,在文章体制上,受唐代科举制度下“行卷”风气的影响。在传奇小说中,尽可能做到史才、诗笔、议论的充分表现,而在对人物描写的技法方面,无论是否用来“行卷”,都侧重在传神写意,写形貌服饰也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的风神韵致。传奇小说是贴近生活的,但又高于生活,使读者有奇异之感。

此外,由于它是作家个人创作的,作者的主体意识也得到更充分的表现。从文言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体认到不同时代作家的心路,感受到他们脉搏的跳动。汉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强调尊王崇礼,作家的主体意识受儒家思想的指导,以礼乐为言动规范,作品的创作个性不够鲜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道、佛盛行,晋朝统治者虽然也曾想以礼治天下,但在实际生活中儒学已无约束力,士大夫或谈玄,或崇道,或信佛,千奇百怪;这种精神状态、文化思想、人生哲学,在志怪小说或志人小说中,有着具体的反映。我们可以感到,那时的士大夫阶层,既自觉其为独立的人,想肆意表现自己的个性,但给人的印象却是狂怪任诞的。唐代的社会、思想文化,都是开放性的,知识分子具有执着的追求精神,他们的人生理想、仕宦心态、对统治者及社会矛盾的看法、审美意识,在传奇小说中得到形象化的表现,作家的个性张力也比较强。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因为与科举制度结合,知识阶层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在所难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出现,启蒙主义思想的兴起,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解放,富于浪漫性的幻想。文言小说中虽然也有一些劝善惩恶的文字,但是比之于某些话本或拟话本小说,封建说教气味并不浓,从“三灯”到《聊斋志异》,我们可以体察到明清时代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历程,看到他们追求与彷徨的心灵世界。

四、文言小说的发展历程

我们从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的结合上来观察文言小说发展的历程,可以把这历史的长河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先秦至西汉:为前小说时期

所谓“前小说”,是指这一时期某些具有小说因素或基本上可以作为小说来读的作品;但是作为一种文体,又还不足以称为小说。它们的作者根本无意创作小说。实际上“小说”的概念尚未确立。

神话传说、寓言故事、诸子散文、历史著作中,都含有不同程度的小说因素。在神话的写神志怪、史书的纪事传人艺术手法上,对后来的小说有着深远影响。原始社会人们的神灵意识,既想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又因屡遭挫折而产生的恐怖感与幻想性,女性崇拜与图腾崇拜,部落之间的斗争,对各种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想象与解释,形成几个系列的上古神话与传说。开始

是民间的口头创作,后来见诸于各种典籍的文字记载,现在看来,就是原始形态的小说。神话传说中奇异怪诞的艺术构思,对后来志怪小说和以唐人传奇为代表的传奇体小说,影响较大

先秦诸子在游说论辩中,虚构短小故事,以形象化的比譬,说明某种事理,这种寓言故事,也具有较多的小说因素。就作者创作寓言的动机来看,是有意识的。汉代以前的寓言,与小说没有明确的界限。包含着许多寓言故事的诸子散文,特别是庄子散文的语言艺术,丰富、生动,表现力强,为小说艺术提供了很好的语言工具。《庄子》中有些篇章,作为小说来读,颇有艺术魅力。

《左传》、《战国策》、《汲冢琐语》以及《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这些史书或“琐语”,也含有小说的因素,胡应麟甚至引据《束皙传》称《汲冢琐语》为“古今小说之祖”^⑧,因其内容记录“诸国梦卜妖怪”等虚妄怪诞之事,它并不是史书。但在古代史书中,也不乏梦卜怪异的记载。现在并不是强拉史传文学充当文言小说的问题,而是要认真探讨它究竟对中国小说有哪些影响。正史不能列为小说是显然的,野史杂传之类,就作者而言,也不是有意创作小说,但它所具有的小说成份更多。《韩诗外传》、《列女传》、《说苑》等书中,有不少精彩动人的故事,小说意味较浓。

(二) 东汉至南北朝:文言小说的雏型时期

东汉末年至隋统一全国以前,分裂的时间较长。在思想意识上,“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了,玄、佛、道兴起。尽管经学亦盛,但已非昔日独尊地位,儒学已无法禁锢人们的思想。这种环境土壤,刺激了小说创作。士大夫谈玄说怪,宗教徒弘扬佛法道术,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并提高了艺术表现力。富于幻想性和善于虚构的宗教信徒所创作的志怪小说,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惯于品评人物的士大夫,在创作志人小说时,很重视对人物神韵风度的描写和语言的简约隽永,创立了以篇幅短小、语言精警生动、突出人物某一方面性格或品质为特征的笔记体小说,并为传奇体小说在人物描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发展很不平衡,无论是志怪还是志人,一部分已渐臻于成熟的小说,如神仙志怪类作品,想象奇妙,曲折变幻,人物形象较丰满,故事也较完整,已经开始注意幻设在小说艺术中的作用;而某些野史杂传,则简直就是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笔记体志人小说,记事写人,文笔清俊简炼而意蕴深长,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气质韵致,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境界。当然志怪或志人,都有不少品位低劣的作品。

(三) 隋唐五代:文言小说由成熟到鼎盛的黄金时期

唐代传奇体文言小说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作者对小说的功能、美学价值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已经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传奇体的文体特点,在于将史传、志怪、志人之长融合为一体,虚虚实实,离奇曲折,记事言情,各尽其妙。通过叙事言情,塑造人物形象,往往有某些事实的影子,而极尽虚构、想象之能事。作家众多,群星灿烂,名篇佳什,不胜枚举,有单篇,也有专集。多数名篇在篇末有几句议论,表明作者的创作动机或对所写故事的评论,这固然是受纪传体史笔的影响,也说明作者对小说功能的认识已有提高。史学家刘知几从史学的眼光苛求小说,对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之类“刍蕘鄙说”虽多贬斥之辞,但也指出小说不应被忽视,从与正史参照的角度肯定小说的价值:“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⑨这就提高了小说的地位。韩愈以文坛领袖之尊,作带有寓言性的传奇小说《毛颖传》,在遭到张籍批评、被嘲笑为“驳杂无实之说”后,敢于堂堂正正地予以反批评,引经据典说明具有戏谑性的文章无害于“道”,倒是“吾子其未之思也。”^⑩意思是说张籍自己思想僵化。柳宗元作《河间妇传》之类传奇小说更多,并为韩愈著《毛颖传》作辩护,肯定它“有益于世”,而讽刺持否定态度的人^⑪。沈既济在《任氏传》中,想借助于狐妖任氏“遇暴不失节,徇人以

至死”的生动事例,对今人起教育作用,并提出“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的主张,即以优美的艺术形式,表现美好的思想感情,在艺术审美和思想教育两方面都取得积极的效果。显然对小说功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些著名的诗文作家也从事传奇小说创作,而且得到上层士大夫的欣赏;小说的社会影响扩大了,地位也就逐渐提高,甚至用传奇小说“行卷”,借以攫取功名富贵,士人对小说价值自然刮目相看,认真写起小说来。尽管许多传奇作品并不是用来“行卷”的,作者也能精心创作,使作品臻于传奇艺术的佳境,像《任氏传》、《李娃传》、《长恨歌传》、《虬髯客传》等最有中国特色的传奇小说,无论是整体艺术构思、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表现手法,都是非常精彩动人的。

唐五代除传奇体小说以外,也有笔记体小说,志怪、博物、佚事、琐闻,包罗万象,无奇不有。北宋初年李昉等编纂的《太平广记》,虽然包括汉魏六朝小说在内,但是就数量篇幅而言,唐五代小说却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艺术水平也超越前代,而对后来的文言小说作者,多所启发。

(四)宋元:承袭唐人余绪而渐趋萧条的时期

人们提起传奇体小说,往往称唐宋传奇,鲁迅选辑《唐宋传奇集》,更扩大其影响。这是就文体类别而言的,其实宋人传奇,无论其数量还是质量,都逊于唐人传奇。

宋继五代分裂割据、天下大乱之后,一统寰宇,其气象规模虽不及汉唐,局面也尚可观。特别是北宋,西北边境虽然战事频仍,内地却也曾有过太平盛世的景象。士大夫多安富尊荣,崇尚现实,而少幻想。许多著名的作家,大都是朝中显宦或社会名流,他们的注意力,专注于诗文的变革,或以词抒发个人情怀,对传奇小说似少问津。宋代科举重在策论,与传奇体小说毫无关系,一般士子也不愿写作与利禄无关的玩艺儿,“传奇体”的文章甚至会遭到士林的嗤笑^①。不过在唐五代蔚为大观的传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遗风,对宋人自然要起作用。李昉等士大夫编纂的《太平广记》,在当时固然尚未广为流传,但其流风余韵所及,仍然有其一定影响,文人写作传奇小说者,也还不乏其人,但具有艺术魅力的传奇作品却不多。史传贵实,小说艺术贵虚,而宋人传奇小说家却缺乏艺术想象和虚构的兴会,如实写来,殆同实录,艺术性不及唐人传奇。这并不是说宋人传奇没有可读之作,只是稍逊唐人传奇一筹,流传至今的作品,大都保持传奇小说的基本特征。例如《杨太真外传》、《梅妃传》、《李师师》、《绿珠传》、《流红记》等,在拾掇佚闻或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创造,艺术性较高,有较强的吸引力。

宋人笔记体小说,数量相当可观,最著名的是南宋洪迈编纂的《夷坚志》,它与《太平广记》一样,都是说话艺人必读的教科书,为“话本”小说所取资。洪迈对唐人小说的艺术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摆脱了视小说为“小道”或历史附庸的成见,而从小说艺术审美的角度去评价它。略早于洪迈的南宋作家曾,编纂了一部小说总集《类说》,在序文中阐明小说的社会作用:“资治体,助名教,供读笑,广见闻”,这一认识比较全面,但对小说的审美价值有所忽视。

南宋至元代,是话本和戏曲繁荣的时代,传奇体文言小说不易直接为市民所接受,作者也没有创作的积极性。特别是元代,一般知识分子既无仕进之途,又需要解决生计问题,于是将其有用之才,倾注于杂剧事业,“偶倡优而不辞”,或者参加书会,编撰为市民群众所喜闻乐听的话本,文言小说被冷落,乃是情理中之事。如前所述,在元代居然出现宋梅洞的传奇小说《娇红记》,可说是个奇迹,但并非不可思议,有唐宋传奇的艺术传统,在元代艺苑,出现这枝奇葩是可以理解的。笔记体小说也有一些,记载佚事奇闻较多。金源诗人元好问,仿效洪迈《夷坚志》,编撰《续夷坚志》,但其小说艺术的价值,已不如洪迈所作。

(五)明清:文言小说由复苏而推向新的艺术高峰时期

明初,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重压下,无论小说、戏曲、诗文,除了皇家剧坛在演一些说忠劝孝、神仙道化之类的戏曲以外,颇有万马齐喑的状态。这种冷落的文化局面,从洪武中期搞文字狱开始,继续了一个世纪左右。在这种环境气氛下,从旧营垒中忽然冲出一个瞿佑,他仿效唐人传奇,写了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紧接着李昌祺踵其后尘,写了《剪灯余话》,赵弼也起而为《效顰集》,这对封建统治者所设的文网来说,至少撕破了文网的一角。成化年间,以写八股化传奇剧本《五伦全备记》著称的理学名家邱濬,在少年时代也是风流浪漫的才子,据说《钟情丽集》就是他带有自叙传性质的文言小说。到了万历年间,在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有中国特色的带有文艺复兴运动性质的浪潮,冲击着封建主义的堤防。文言小说的创作,也乘势而起。邵景詹效法瞿佑,写《觅灯因话》,宋懋澄《九签集》中,也有不少传奇小说;王同轨《耳谈》主要是笔记体小说,也有一些传奇小说。此外,明人还编纂了好几种文言小说总集或专集,其中有些单篇也是明代的作品。总之,文言小说在明代,已形成复苏之势。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大学者胡应麟对文言小说的论析研究,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他把小说家提到与儒、道、释平起平坐的地位,称赞写怪力乱神的志怪小说为“俗流喜道”,群众喜欢就有它存在的价值,他的研究带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理论色彩。

文言小说复苏的势头,到了清代,出现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标志的文言小说新高峰。《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以志怪,而与之相颉颃的,是纪昀用六朝笔记体小说的写法,创作了《阅微草堂笔记》,文言小说创作阵地上形成两军对垒的态势;在竞争中,两种不同写法都曾出现一些优秀之作,但就总体而言,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传奇小说,显然居于优势,更受人们的青睐。但也必须指出,《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都有许多是锁碎的杂记,缺乏小说艺术的审美价值。文言小说的余绪,一直延续到近代社会的文坛。在清代,文言小说蔚为大观,文言小说的选集、总集相继出现。

五、文言小说与各体文学的关系

我国的文言小说,从其萌芽状态即所谓前小说开始,就不是很单纯地用散文记叙故事或描写人物的。它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穆天子传》描写穆天子在昆仑会见西王母,互相以歌谣应酬,为人物形象增添了人情味和生活气息。史传文学中某些小说色彩较浓的篇章,也穿插有人物抒情性的歌辞,渲染人物在特定条件下的思想感情或环境气氛。例如《左传·晋楚城濮之战》晋侯听“舆人之诵”,《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还乡时吟诵的《大风歌》,《项羽本纪》描写项羽垓下之围所发“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绝唱,野史中也穿插有歌辞。杂记体小说《韩诗外传》,引《诗》以证事的方式,为后世章回体小说所袭用,不过所引证的不是《诗经》之诗,而往往是集唐人诗句或作者杜撰。《搜神记》等志怪小说,也有某些抒情诗的成份。魏晋以后,小说与诗的结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陶渊明的名著《桃花源诗并记》,诗与小说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到了唐代,传奇小说与诗的融合,更是普遍的现象。张文成《游仙窟》,作者与女主人互相酬答,以诗歌相应和作为调谑方式,诗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把互相戏谑的诗抽掉,《游仙窟》就失去它的基本特色。唐人传奇的繁盛时期,许多著名作品,都穿插了诗歌。所谓史才、诗笔、议论的统一,其中诗笔是唐代举子的基本功,所以,在有“行卷”效应的传奇小说中,表现作诗才华,是理所当然的。宋以后,尽管不以诗赋取士,但在继承古小说传统的小说中,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杂用诗词以抒情,成了通例,特别是带有言情性质的作品,男女双方经常以诗词歌赋相酬答,倾诉爱情。“三灯”、《聊斋志异》都有较多的诗词成份,白话小说《红楼梦》的诗词,更达到了

极致。

文言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关系,已于前述,史传文学对文言小说,乃至章回体白话小说的影响,极其深刻,说它们是孪生兄弟,大概并不过份。文言小说与古代散文,当然有区别,但又有着密切关系。小说用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描写环境景物,虽然有韵文成份,但是主要是散文。汉魏许多杂传体小说,篇幅较长,叙事宛转,就是得力于古代散文的表现力。六朝志怪小说在叙事写人方面不如汉魏,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恐怕也与六朝萎弱的文风有关。唐代的古文运动,更促进了文言小说的发,而唐人传奇的辉煌成就,也正是古文运动的业绩之一,它对巩固和扩大古文运动的成果起着积极作用。

就文体流变而言,文言小说的许多题材,为戏曲、话本小说所取资,这是众所周知的。抓住文言小说这一重要环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民族传统文化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对戏曲、话本小说题材的来龙去脉,艺术表现手法的发展变化,会看得更清楚。

注 释:

① 《论语·阳货》

② 《典论·论文》,见《文选》卷五十二。

③ 《论语·子张》

④ 《庄子·杂篇·外物》

⑤ 班固之说,见于《汉书·艺文志》。

⑥ 《中国小说史略·序》

⑦ 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

⑧ 《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

⑨ 见《史通·采撰及杂述》篇。

⑩ 韩愈之说,见其《重答张籍书》。

⑪ 柳宗元之说,见其《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并可参阅其《与杨海之书》。

⑫ 北宋古文家尹师鲁,把他的师友范仲淹作的《岳阳楼记》,戏称为“传奇体耳”!带有嗤笑意味。

见陈师道《后山诗话》。

(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煊)